



中共党史文集

(第四辑)

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

业经省出版局吉业字
第〇四八号文批准

中共党史文集

第四辑

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

长春冶金地质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开本32 印张4

印数1—900册

GDF 52/22

说 明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我们党史学会于今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七月七日至九日两次召开学术讨论会，先后收到七十一篇学术论文。在群众讨论评议的基础上，常务理事会审定了二十四篇论文编辑出刊为《中共党史文集》第四集，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本集主要辑录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历史经验、历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等方面的文章。由于编辑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粗漏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八月

目 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事业胜利的

保证……………郑德荣 陈一华 黄景芳 (1)

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

所犯的错误加以区别……………邵鹏文 (23)

毛泽东思想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

——重读刘少奇同志的《论党》……………那荫桐 (36)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

……………李致平 何世芬 (51)

名冠千古 功盖历史

——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六十年……………邵文超 (69)

蔡和森同志在建党上的重大贡献……………李 勤 (88)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形式问题……………司亚民 张庆峰 (102)

改组后的国民党到底是那几个阶级的

革命联盟……………母庆和 (117)

瞿秋白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

论述……………刘显斌 (131)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汪精卫……………滕亚屏 (143)

再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王维礼 杜文君 (165)

中央苏区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

强大后盾……………严启祥 (177)

从“皖南事变”看王明投降主义的	
危害·····	唐继革 (186)
我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伟大胜利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	唐继革 白玉武 (205)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伟大转变·····	李 勤 (221)
坚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谈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几点看法	
·····	董胜贤 (237)
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关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七年的问题	
·····	王元年 (249)
“八大”在我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及其伟大功绩·····	郭学洁 刘和忠 (267)
试论我党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	
历史经验·····	常吉林 (284)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	
伟大转折·····	宋 春 顾 民 (305)
试论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的	
性质和任务·····	张大庆 (322)
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试论中国无产阶级局限性》一文质疑	
·····	曹仲彬 (333)
学好党的历史 纪念建党六十周年·····	金贵男 (353)
历史上纪念党的生日情况介绍·····	葵 闻 李志春 (362)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事业 胜利的指针

东北师范大学 郑德荣 陈一华 黄景芳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锐利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接着，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我国遭受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国家复兴，历经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寻找救国的真理。然而，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所有的革命都没有达到胜利。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毛泽东同志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的真理。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经济文化落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只占少数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解决革命问题，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04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集中了党和革命人民斗争的经验，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一经产生并被全党所认识，就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以马列主义来号召、团结、组织中国人民起来斗争。根据列宁的关于殖民地革命学说，党的“二大”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并帮助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从而有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在这期间，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等同志力求用马列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论述革命运动所遇到的问题。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集中了党内正确意见，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但是，由于党还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缺乏统一的理解，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当蒋介石、汪精卫一叛变，就使大革命遭到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集团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残酷地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使中国革命处在十分危险之中。

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八月七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确定实行

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强调指出：今后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毛泽东与湖南省委一起领导了秋收起义，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在实际上开始走上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统治全国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比较来说，可谓星星之火。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地对井冈山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边界斗争十分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在井冈山的同志们中间就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第172页）毛泽东总结了一年来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论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条件，指出：

“在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第48页）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一）由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第49页）帝国主义之间和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军阀之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造成中国长期的军阀分裂和战争。只要军阀分裂和战争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而“地方的农业经济”（第49页），又为红色政权在农村存在提供物质条件。（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给南方各省人民以深刻影响，特别是湘、鄂、粤、赣等省的工农群众在

大革命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建立工农武装，因此党在这些地方首先建立红色政权是完全可能的。（三）由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因此“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50页）（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五）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毛泽东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工作包括：建设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主要内容。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明了井冈山斗争的方向。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红军主力打破敌军的围剿，到一九三〇年革命根据地由井冈山发展到赣南和闽西，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军委，推广了井冈山斗争经验，推动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三〇年建立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十万余人。

在创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林彪反对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流动游击”的主张。为此，毛泽东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阐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批评了“流动游击”的思想。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第95页）

这样，到一九三〇年开始形成了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结合中国社会条件，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问题。它标志着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随着革命战争和红军的发展，在红四军内部反映出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如何建设人民军队，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其中一部分节选入《毛泽东选集》，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毛泽东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第84页）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制度；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和优待俘虏的原则。为了建设人民军队首先必须抓好红军中党的建设。毛泽东指出：红军中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思想斗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重视组织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度。这样就解决了党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党的主要部分长期在农村的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和党领导下的新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从一九三〇年年底到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连续对中

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以四万红军，粉碎了大于自己几倍到十倍敌人的三次围剿。在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总结了军事斗争的经验，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并于一九三六年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提出了“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运动战、歼灭战以及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战略战术等重要原则。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指导我军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并给马列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这个时期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出现了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建军思想和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原则。其结果，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的组织遭到更严重的损失，使中国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教育了党和革命人民，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是正确的；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期以来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分管军事。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代表的“左”倾机会

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移师北上，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接着，又粉碎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取得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国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以后，一九三五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在这一历史关头，我党能否正确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这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问题。同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同盟也是可能的。毛泽东还深刻指出，地主买办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无产阶级应当而且可能利用它们内部的矛盾，同那些不可靠的势力结成暂时的同盟，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党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推动和影响下，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在西北，

党争取联合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显示了党和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的伟大成功。一九三七年二月我党向国民党正式提出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首先得到宋庆龄、何香凝等的响应，他们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得到了通过。从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为芦沟桥事变后，实现抗日战争，创造了前提条件。

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一九三七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名的哲学著作，阐述了我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一九二七年春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进行了多次的农村调查，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状况、阶级状况，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点。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进行社会调查，是为了做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4页）他提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同上，第22页）

《实践论》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指出，人类社会的实践是人的认识来源，“理论的基础是实

实践”，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第261页）指出：

“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脱离具体的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第272页）

《矛盾论》运用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特别着重地阐发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指出：不同事物都有不同的矛盾，每个事物矛盾着的各个方面各有其特点，因而解决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指出：没有离开特殊性而孤立存在的普遍性，也没有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因此，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则完全违反这一原则，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不~~不~~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质的矛盾。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当成千古不变的教条，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脱离，使中国革命遭致严重损失。

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阐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条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抗日战争是一个强国的日本，对一个弱国大国的中国的战争。在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战场的大溃退和某些战役上

的胜利，发生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不同的论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怎样认识中日之间这场战争，中国能不能打赢？怎样进行这场战争？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前后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对立的基本特点，正确地阐述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的双方存在着互相对立的四个基本特点：（一）敌强我弱。这个特点，决定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不能速胜。因此，速胜论是不对的；（二）敌退步我进步；（三）敌小我大；（四）敌寡助我多助。这后三个特点，决定中日战争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深刻分析了这四个特点在战争中的变化及趋势，认为随着战争的推移，有利于我的因素将日益发展，不利于我的因素将逐渐减弱，乃至最后战胜敌人。因此，亡国论也是错误的。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指出，要使弱国战胜强国，必须依靠人民，动员人民进行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兵民是胜利之本”，（第476页）“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第448页）毛泽东提出必须实行敌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基本作战方针。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阐述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批评了在抗战开始时党内军内存在着轻视游击战的思想。指出：我们是一个弱国大国对强国小国，这样，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

从而根据地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因此，“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加以考察”。

（第 374 页）

毛泽东关于中日双方四个基本特点的分析，关于持久战战略方针和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论述，揭示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弱国战胜强国的规律，规定了弱国战胜强国的路线。它不但是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也为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和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构成了无产阶级的军事学说。

由于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是被迫的，他们和共产党合作是为了利用抗日削弱或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在抗日初期还有些抗日的积极性，但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和美英战略方针变化，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三年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起，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又指出党内要反对投降主义倾向。王明在一九三七年底回国以后，引导党内右倾倾向，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中全会上批评了王明投降主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

和战略问题》的结论，接着在一九四〇年又发表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毛泽东指出：“顽固派有反革命两面性，对其尚能抗日方面要加以联合，对其动摇投降倾向要进行斗争加以孤立，对其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反共方面坚决加以打击”，“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政策的、策略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第706页）在和顽固派斗争中，毛泽东规定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斗则必胜”和“适可而止”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抗日战争中，顽固派虽然制造多次反共磨擦事件，出现了対日妥协投降逆流，然而由于我们坚持了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策略总方针，因而保持了国共合作，保持了全国抗战的局面。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共的需要，雇用了大批反动文人，大搞“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叫嚣“收起”共产主义，“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推销举民族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

“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第623页）为武装全党，剥夺反动派的精神武器，教育人民，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十二月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系统